

文艺复兴时期的 思想与艺术

（增补版）

【美】约翰·阿诺德·阿什摩尔著 陈
海山译



THE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 广西美术学院出版社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

(增补版)

[美]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 著

邵 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 / (美)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 邵宏译.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6.5

书名原文: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ISBN 978-7-5494-1565-6

I. ①文… II. ①克… ②邵… III. ①文艺复兴-思想史-研究-欧洲
②文艺复兴-艺术史-研究-欧洲 IV. ①D095.03 ②J150.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276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广西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

著 者: [美]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

译 者: 邵 宏

策划编辑: 冯 波

责任编辑: 谢 赫 陈曼榕

版权编辑: 韦丽华

封面设计: 陈 欢

版式制作: 李 力

责任校对: 梁冬梅 陈小英

审 读: 肖丽新

责任印制: 凌庆国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编: 530023)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5 千字

出版日期: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4-1565-6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 1	
1990 版序言 / 9	
1980 版序言 / 13	

人文主义

I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术	19
II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道德思想	38
III 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欧洲的传播	92

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

IV 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	116
V 菲奇诺和蓬波纳齐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131
VI 对帕多瓦的阿威罗伊主义和亚历山大主义的新研究	140

艺 术

VII 意大利散文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151
VIII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音乐与学术	174
IX 艺术的近代体系	196
X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	261
后记 “创造性”与“传统”	283
索引	297

中译者序

曾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的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 20 世纪文艺复兴研究领域里的权威人物。中文读者对他的熟悉, 始于 1987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陶建平译), 本书向中文读者展示了他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历史和艺术方面的学术成就。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一书, 最初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 1980 年出版, 所收文章来自作者 1965 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二: 人文主义与艺术论文集》[Renaissance Thought II: Papers on Humanism and the Arts], 1990 年再版时又补充了两篇文章, 分别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和《“创造性”与“传统”》。此次译作依据 1990 年版译出, 全书共有十一篇文章, 分别归入三个论题: 人文主义、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艺术。所收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从 1944 年到 1989 年, 涵盖了作者学术研究的鼎盛阶段。由此, 该书被西方学者誉为“每一位思想史研究者的范本”, 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人文主义”这一专题所收的三篇文章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道德思想》和《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第一篇文章是读者理解作者学术

成就的出发点。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将众说纷纭的“文艺复兴时期”大致界定为从 1300 年到 1600 年的历史时期。而对“人文主义”的意义，作者不赞成现代流行的观点，将人文主义说成是强调人的价值。作者以文献为基础提出：“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术语是由“人文学者”[Humanist]一词发展而来，它可能源于当时意大利大学生中的一句俚语：人文学者是 *studia humanitatis* (*humanities*[人文学科]) 的教授或学生，有别于法科学者 [jurist]。*studia humanitatis* 一词借自古典作家，用来系统强调一些当时已设置的学科专业所具有的人文和教育价值，该词自 15 世纪初起便代表着一个教学课程系列：语法学、修辞学、诗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所有课程都以阅读古典希腊和拉丁著作为基础。正是以这一认识为起点，作者完整地描述了人文学者的职业范围、所涉猎的学科以及与古典传统的联系。

在第二篇以人文主义的道德思想为主题的文章里作者认为：道德哲学不像哲学的其他学科，它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由此明确了文艺复兴道德思想与人文主义之间的联系。当时讨论道德问题的文献主要由人文学者撰写，或者由具有人文训练的平信徒撰写，亦即实际上所有讨论道德话题的作者都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由于许多人文学者的职业是教师，因此他们的道德思想强烈地关注于年轻人的教育。人文学者将古典文化视为他们思想和文学方面的主要指南和典范，所以在他们的道德写作中大量引用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引用古代史和神话的事件情节，引用古典哲学家和作家的观点和理论。最后一点，人文学者是专业的修辞学家，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仅希望说出真理，还希望从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标准的角度说得优雅。全文以广泛的文献为背景，阐述了文艺复兴的道德思想留给我们的学术传统和文学传统。

作者在这一专题的第三篇文章里考察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欧

洲的传播。作者专门讨论从 1350 年到 1600 年的这一时段里，意大利人文主义通过不同途径的有效传播对西欧和中欧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描述传播的几个主要渠道，作者认为，各国本土人文主义的兴起都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有关。通过大量文献，作者向读者描述了这一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普遍的模式似乎是一个适应性改变而非单纯模仿的模式，这点可以解释人文主义在不同国家何以有多少不同的形式。

本书的第二个论题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这一专题里，作者收入了三篇文章：《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菲奇诺和蓬波纳齐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对帕多瓦的阿威罗伊主义和亚历山大主义的新研究》。三篇文章的篇幅都不长，却表现出作者对文献的控制、阐述，以及个案研究的能力。在第一篇文章里，作者以文献为据说明，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并不是如历史学家之前所认为的，像 16 世纪的学院那样的一个组织化机构，它只是一个以菲奇诺 [Marsilio Ficino] 为中心的圈子，除了菲奇诺的学说没有其他的共同信条，它与梅迪奇的圈子或者说宫廷联系密切，但不等同于后者。“学园” [Academy] 这个名字只是用来模仿柏拉图的学园。这个圈子包括有一些有独立见解和兴趣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的思想和兴趣有时与菲奇诺的大相径庭。但柏拉图学园却有效地填补了佛罗伦萨传统文化中哲学研究的空白。

这一论题里的第二篇是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1944 年。在《菲奇诺和蓬波纳齐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文里，作者通过对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菲奇诺和蓬波纳齐 [Pomponazzi] 的宇宙观研究，来阐述两股潮流如何延续了先前的中世纪传统，与此同时它们又如何用新奇的术语来阐述传统的问题和学说，以及如何代表了两个传统历史中的新阶段，并分析它们各自的功过得失。

《对帕多瓦的阿威罗伊主义和亚历山大主义的新研究》是这一专题中的第三篇文章。在这篇只有五千多字的文章里，针对传统学术中所谓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威罗伊主义 [Averroism] 和亚历山大主义 [Alexanderism]，即被称作“帕多瓦学派” [the school of Padua] 的观点，作者依据新发现的文献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哲学史是基于“科学和经验的证据”，就哲学史而言，它由文本和文献证据所构成。一种历史看法只有能得到此类证据的支持才有效。作者提出：从今以后不谈“帕多瓦的阿威罗伊主义”，而是谈意大利世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样做会更合适一些；要承认帕多瓦在之后的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也要给博洛尼亚和其他大学应有的名分。

本书的第三个专题“艺术”加上“后记”，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三篇幅；这一部分也是译者的专业兴趣所在。《意大利散文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作者以大量的文献归纳出几个基本的结论：14世纪没有为意大利创造出一个共同的书面散文语言，这一任务留给了16世纪。16世纪没有完全废除拉丁文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使用，这一任务留给了19世纪。15世纪没有阻断方言文学的发展，而是在缓慢的进程中明确地向前推进，这个缓慢的进程从14世纪延伸至19世纪，它引导着意大利书面散文语言从在托斯卡纳谦恭的开始，直到今天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民族文明独一无二的语言媒介。意大利语缓慢的兴起也伴随着书面拉丁语同样缓慢的衰落。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音乐与学术》一文中，作者对文艺复兴初期音乐的体制——大学中的音乐教席、教堂唱诗班和宫廷里的音乐生活做出了清晰的描述。继而考察了当时两大思想潮流，即人文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对音乐的影响，提出音乐在佛罗伦萨学园的创办人和领导人菲奇诺的生活和思想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并指出音乐创作与方言诗歌之间的联系，以及音乐与公共庆

典演说的关系。

《艺术的近代体系》一文约四万多字，是全书所收篇幅最长，也是作者最具纪念碑意义的文章。该文被收入莫里斯·韦茨 [Morris Weitz] 编辑的第二版《美学问题：文选导读》[*Problems in Aesthetics: An Introductory Book of Reading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108-163)，该文无脚注的简写本被收在 W. E. 肯尼克 [W. E. Kennick] 编辑的第二版《艺术与哲学》[*Art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7-33)。又曾被译成德文发表在《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之二》[*Humanismus und Renaissance II*] (Munich, Wilhelm Fink, 1976)，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文艺复兴的观念及其评价》[*Concetti rinascimentali dell' uomo e altri saggi*]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78)。该文也被译成中文发表在《美术史与观念史》年刊 (II 卷，邵宏、李本正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37 — 522 页)。本书译者对作者的了解，也始于 1988 年范景中教授向译者推荐阅读此文，以及 1997 年范先生又催促我译出此文。

作者在该文里认为，尽管人们常常把“艺术”、“美的艺术”或者“Beaux Arts”只等同于视觉艺术，然而它们通常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在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艺术”一词首先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这五门大艺术 [major arts]。这五门艺术是近代艺术体系不可分割的核心，但这个有关五门大艺术的体系，起源于比较近的一个时期，在 18 世纪之前还没有明确地定型，尽管它的许多成分可以追溯到古典、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考察提出：到了 18 世纪上半叶，业余爱好者以及作家、哲学家们对视觉艺术和音乐的兴趣大增。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由外行以及为外行所写的关于艺术的评论文章，同时也出现了将各门艺术相互比较，将艺术与诗歌做比较的论文，并且

最终使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确定下来。由于这个体系似乎是逐渐出现，而且有关的作者虽然有影响但却不算是最重要的，这个体系在他们的文章里又经历了许多变化，因此可将这个关于美的艺术观念和体系看作是在巴黎和伦敦文化圈中的谈话和讨论中逐步发展和明确下来的，而那些正式的文章和论文只是反映了来自那些讨论的观念倾向。

本专题的第四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是作者为本书1990年版增补的。作者认为，修辞学仅仅是由人文主义者所培育的五门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其他四门为语法学、诗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而西塞罗[Cicero]的《论创意》[*De inventione*]和托名西塞罗的《献给赫伦尼的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是整个中世纪的基本文献。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修辞学的完整文献通过原文和拉丁文以及方言译本的方式，变得为西方世界所知晓。文艺复兴修辞学尽管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古典和中世纪的前辈们，但它却有着自己的面貌，它也不止以一种方式与其他四门学科发生联系。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包罗广泛的文艺复兴修辞学史，它必须基于对文献的周密研究，它不仅要描述修辞学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史，它还要描述修辞学理论与实践对文艺复兴文明所有其他领域的影响。

作为本书后记的《“创造性”与“传统”》一文，是作者为1990年版增补的第二篇文章。作者在本文中指出：在最近的文学和大众讨论中，“创造性”[creativity]这一术语被频繁使用和误用，但是它的词义含糊不清和定义不当，并且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论证。事实上，原创性[originality]不是艺术作品中的主要因素，并且不应该是艺术家的主要目标。而传统并不构成与创造性的简单对立，只不过是创造性的倡导者们将传统树立成了假想的对手。由于创造性的捍卫者已经如此激烈地反对传统，便愈加诱惑人们用

一种夸大其词去驳斥另一种夸大其词，以及过分强调传统的价值。作者认为：艺术作品和人类其他行为的杰出性，通常并不是仅仅归功于创造性，而是归功于原创性和传统的结合。创造性会完美地与选择运用有价值的传统成分相结合，以产生出杰出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和抽象的思想著作。

借此序文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第九章的前五节基本依据天津美术学院李本正教授译笔老辣的初稿，因为李教授已经用恰切而准确的汉语表达了原文的意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在此我只能对李教授表达敬意和歉意。与李教授合译的《艺术的近代体系》发表后，我又在用于教学的拙著《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艺术的概念衍变”里，将现有汉译西方著述和文献与克利斯特勒的论述和所涉及的文献做了互校性释义 [paraphrase]，并按照学习英文写作时的规范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的要求，一一标明了出处。不过我得承认，我自读硕士以来的专业写作一直以我曾翻译过的贡布里希和克利斯特勒的著作为范本。

我要感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耀春教授。彼时未曾谋面的刘耀春教授在读过译者的拙译文及拙著之后，遂向东方出版社力荐本人作为本书的译者；全书译毕，他还不辞辛劳地审校了全译稿，并向译者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使本译著得以较为完整地出版（东方出版社，2008年）。此次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再版，刘耀春先生审校过的译稿便是我能较从容地重新校译的底本；外国人名译名参照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的“译名手册”系列；为保留作者所用的圆括号、引号和破折号，译者只使用方括号，慎用破折号，不用引号；我觉得，译文中滥用引号和破折号常常会减损原文本身的文气甚至害义。

我想将这本译著献给我的导师范景中教授。是他最早让我读

到克氏的著作，从而使我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是他一直关心着本书的翻译进度且督促我认真工作，我也在翻译过程中时常与他交流有关译语和原文理解问题；最重要的是，没有他的长期教诲，我可能不会继续对西方艺术思想史有持久的兴趣，由此也就不会有这部译著在“原创性崇拜”的时代里出现。

邵宏

再序于 2015 年 3 月 3 日

1990 版序言

[vii] *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 1980 年出版，最近已告售罄，为此我要感谢出版社和德博拉·特加登 [Deborah Tegarden] 小姐，因为他们决定再版此书并增补两篇初版未收入的论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最初发表在詹姆斯·J. 墨菲 [James J. Murphy] 编辑、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雄辩术》[*Renaissance Eloquence*] (pp.1-19)。《“创造”与“传统”》一文，发表在已故的菲利普·P. 威纳 [Philip P. Wiener] 编辑的《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3, 44:105-113)。我对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意在此转载第一篇文章表示谢忱，同时我还要感谢《观念史杂志》编辑唐纳德·R. 凯利 [Donald R. Kelley] 教授，他同意在此转载第二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讨论文艺复兴时期思想与文学的关系，适于对本书第七章关于意大利散文语言的论文做相关补充。尽管修辞学 [rhetoric] 这个术语，像其他许多术语一样，最近已变成了巫术似的、极度滥用的词语，但近年来，许多学者包括本人仍一直强调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文化中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修辞学并非如瓦

* 页边码为原英文版页码，供查检书后索引使用。

拉 [Valla] 和他的某些近代追随者所认为的是哲学的替代物，它实际上是另一种文类和学科。许久以前，从我的老师沃纳·耶格 [Werner Jaeger] 和爱德华·诺登 [Eduard Norden] 那里，我学会了理解这门学科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直至现代的重要意义。

[viii] 第二篇文章篇幅不长，收入本书作为附录。与本文集中的其他文章相比，这篇文章较少学术味却更多争辩气，但它仍然关涉既已存在的思想与艺术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其他历史时期，包括我们所处的当代也都存在着这种联系。该文讨论和批评了“创造”——这一相当晚近出现的概念，但是它已经成为当代话语中一个不容怀疑的概念。该文起初是应一家全国性的权威机构之约而作，后又被约稿者拒绝采用；这家机构此前曾以“创造”为主题举办过学术会议。不过，该文于《观念史杂志》发表前却得到我的几位同事和朋友的称许。后来，该文被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期刊《猎兔狗》[*Il Veltro*] (1984, 28:17-29)。这段插曲说明一个未被广泛承认的事实，即我们在某时某地享受无政治审查制度的极端自由，同时另一种审查制度——基于各种意识形态或服务于时尚女神的审查制度——却针对流行思潮的反对者秘密地运作，而无视反对意见的合理性或它的事实与逻辑依据。我很高兴有机会让这篇文章与本文集的读者见面。相信该文对时尚观点的讽刺批评，会被许多持有先入之见的读者嗤之以鼻，因为文章所诘问的正是这些固有的成见，但我希望它会受到另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尽管可能是小部分的读者。

我不想在此重复 1980 年版序言里对公众和学术界当下态度所做的评论，公众和学术界对所有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思想史研究有或多或少公开的敌意。我以为，这种敌意在过去的十年里非但未有舒缓，反而是变本加厉。基于经受检验的文献学方法和对原始文本与文献作详细解读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研究——我认

为这是唯一有效的研究依据——被贬损和被视作“传统的”而遭到抛弃；持这种态度的不仅是记者和大众传媒作家，甚至包括学术圈内的一些人物。他们更愿意依据翻译的版本和二手材料来写作，他们采用简单化 [reductionist] 的方式方法，这类方法是纯粹玄想的和随意性的，甚或是报道似的（但被称作是新奇的、优于“传统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被冠以心理学、新历史主义、社会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理论、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语言学、分析哲学或阐释学之名；他们且时常故作对往日的思想家和作家的思想有新发现，而这些新发现却与那些思想家和作家的原意大相径庭。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哲学与哲学史学》，《观念史杂志》[1985, 82:618-625]）里，我称这类方法为“口技法” [ventriloquistic]，并且我惊讶地注意到，一位当代的“口技法”从业者一直试图积极曲解这一术语。我还想将这类方法称作“超文本的” [extratextual]，影射时髦的用语——文本性 [textuality] 和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这些人造术语除了增添一种新奇的气氛，不能给熟习的文献研究和影响研究以些微的增益。所有这些方法都不重视文献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而是竭力解读文献里没有的以及无法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这类研究的倡导者相信，他们通过将现代观念强加给过去而丰富了历史，但由于忽略和遗忘了绝大部分的传统文献，放弃了传统文献所能提供的多种观念和见解丰富现代读者的机会，他们因而在事实上使当代和未来趋于枯竭。上述种种又受到一种不置可否的相对主义保护，这一理论宣称，所有的解释同样有效；它完全不顾真实的情形：部分有效，部分不确定或有可能，部分全错，且与已知事实及逻辑话语和一致性原则相反。我所称的 *argumentum ex ignorantia* [源于无知的证据] 被大量利用，亦即幼稚地或有意地漠视已知事实和提出与原作者相悖的观点——这一切之所以热闹地公之于众是出于一个（正确

的)假设:同样无知的读者和批评家不会明白其中有何不妥。当然,我不希望夸大其词,而且我承认近年里确有不少出色的研究发表,研究者中既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他们都回避了我所批评的那些流行错误,也未向它们做些许的让步。

我或许年事太高而不能理解或欣赏这些新潮流和它们的宏旨。但我清楚,许多年轻学者赞成我的看法,他们的学术研究受到现代江湖骗子们的政治和学术打压,因此他们不能公开表达对这类方法及其倡导者的看法。因为我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有义务代表众多青年学者和持续的学术传统发言,我希望这一持续的学术传统能在目前种种时尚和愚行中幸存,就如它应对先前的诸多思潮一样。尽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我尚未看到学术传统能够幸存的迹象,但我仍以这一祈愿来结束本文。尤其是,与许多幸灾乐祸的当代灾难预言家不同,我像卡珊德拉 [Cassandra] 一样,衷心希望我的担忧和预言毫无道理。

我愿将本书献给汉斯·扎雷 [Hans Sarre], 为了我们终生的、共同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而长存的友谊。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1989年9月21日

1980 版序言

[xi]

现在的这本《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是 1965 年哈珀火炬丛书初版《文艺复兴思想之二：人文主义与艺术论文集》[*Renaissance Thought II: Papers on Humanism and the Arts*] 以下简称《论文集》的新版，该《论文集》已售罄有一段时间。本书完全不同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及其源流》[*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 Sources*]。《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及其源流》一书，除了新增加的几章，还包括了哈珀火炬丛书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Renaissance Thought*] (1961) 和《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概念》[*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an*] (1972) 这两本书里的大部分内容。后者业已绝版，作为哈珀火炬丛书之一的前者，坊间仍见有售。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本书所收的论文又可以与学者、学生和其他有兴趣的读者见面。我意识到，这些论文十五年后仍以当初发表的形式重印，也许会被某些批评家认为过时。近些年，我从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学者的成果中获益良多，我本应当将一些细节和参考文献补入文章里。另一方面，自从这些文章发表以来我一直未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并且，我必须高兴地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当初所提出的一些像是异端邪说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却是无疑的，甚或是不值一提的。